

阿车服饰浅谈

双柏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潘林宏（彝族）

阿车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自称“纳夷颇”。主要居住在绿汁江沿岸地区，即今楚雄州双柏县的法裨、雨龙、安龙堡、大麦地、玉溪地区易门县的绿汁、八街、峨山彝族自治县的大龙滩、富良棚、塔甸、化念、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新化、老厂等十多个区以及元江、墨江等县的部份地区，约十多万人口，系彝语南部方言。根据民间传说和家谱资料表明：阿车大多数都从滇池和滇东一带迁入，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就从装饰说来，主要以修镶长袖面襟衣为重，其中又以女式服装较具有特点，本文拟阿车服饰为对象略述己见，敬请方家指教。

一、服饰特点

人类自从脱离了野蛮时代而进入文明社会，最初用来御寒的衣物大大超越了原来的使用价值，寓审美需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于取暖遮羞的服饰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与艺术。服饰又是记录人们历史文化的园地。每一个民族的服饰上都闪耀着本民族文化的光芒，在长期的民族分化和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各自都继承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民族服饰大观园。同一民族中也因发展上的不平衡和受文化交流的不同影响，往往有多种多样的服饰构造，或表现在它的款式上，或表现在它的色泽上，或表现在它的图案上。

或一个民族
或表现在它的结构上等等。这就使我们今天研究一个民族的某个支系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状况提供了可考的资料。

通过纷繁复杂的服饰资料的对比和实地考察，阿车服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根据人体结构部位增强线条美的服饰特点。阿车服饰人们管叫它“镶服”。虽然它以精镶巧绣而闻名，但又花而不稍，繁而有序，纹路及图案也没有象其他服饰庞杂，具有适中、得体的和谐美。比如我们看到的阿车服饰一般修镶托肩、胸襟、袖子、裤腿等部。不难看出人的肩头、胸襟、袖子、膝部等都是较显目的地方。做衣时要是这些部位稍加突出，具有明显的线条，并且显得有骨有肉有魅力。其次，这些部位又是附着力较大的地方，修镶后一方面增强了服饰的美感；一方面增加了厚度，即使是经常受磨也不致于先损。因此，阿车服饰构造具有两全齐美的效果。

(二) 以条形配色为主的服饰特点。阿车服饰用多种布料镶拼而成。但它又不象其他服饰那样用块状结构和其他几何图案结构。服饰上的各种图案，不是直接绣在“底板”上，而是先将布料剪成条形，然后把图案绣在布条上，再镶到“底板”上。有的却不用针绣，而用特殊配制的颜料把图案勾画在布条上来镶，有的则不加图案，却用不同颜色的布条按其色泽特点和谐地镶拼起来；有的也用本色的布条相拼。这些镶衣用的布条一般大小一致，因此，阿车服饰基本上成均衡的条形配色结构。

(三) 以花草为主要装饰图案的服饰特点。阿车服饰图案新

思巧妙色彩艳丽真可谓琳琅璀璨。在驳杂的服饰图案中很少有动物作装饰图案，也没有“死”的图案，除了围腰和头饰上（主要是银品）偶而有些鱼、蝴蝶、罗汉等外，一般看不到动物类图案。佩带分这类动物图案也都是由于某种世俗观念的原因，这一点将在下文介绍。在阿车服饰中植物类图案充斥着整个装饰图案系统，其中又以草和蔓生植物为最多，以双柏县安龙堡区他尼龙乡阿上左村袁翠仙于1938年缝制的一套镶服为例，全套服装共有6种图案皆为花草类，在15种587件银饰品中花草类图案达13种522件。可见，以草为装饰图案是阿车服饰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服饰造型的象征性意义

阿车服饰的款式基本与彝族其他支系相一致，这表明他们有共同的史渊源和共同的文化特征，是一个民族整体。但是，也有独自的风格，这些差异的形成原因固然很多：有地域的关系，也有民族杂居的原因，而主要地是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服饰图案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阿车人生活在山区河谷地带，常依龙泉而居，由于这些地方常年阳光充足又有泉水滋润，水草丰盛四季长春。人们生活这样的环境中，无不受繁花似锦的景致所诱惑，从而享受到美的创造，开始了对自然的描摹，采自然的美妙织自己的艳装，们把常青的花草绣在衣物上，以示青春常在。阿车有句俗语：“若要村老，就须发新叶”，以新叶来比喻别致的服饰，用艳装来衬托人的青

春气息，体现了阿车人民向往美好生活和拥有青春活力的欲望。阿车人不仅把花草视为青春的象征，而且把它看成吉祥之物，美好生活的寄托。姑娘们常常把自己最喜爱的花草绣在鞋垫上或荷包上送给心上人，小伙子们也常常买印有鲜艳花草的围巾赠给情人。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自然环境，人们要形象地描绘这些花草是不可能的。假定一个生活在高山上从来没有到过海边的人，要他描绘海藻的形状来，他也会感到无从下笔的。所以说阿车服饰图案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

其次，服饰造形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如前所说，阿车人多依山而居，以农耕为生。因此，劳动对象（田地）也有一定的特点。一般都成条形，依其山坡阶梯状摆布，若是在栽插季节，远远望去，就如一条蛟龙缠绕在坡上，一圈一圈的；若是在金秋季节，层层梯田又象是一条条彩带镶嵌在山上一样，宛如阿车服饰上的彩带。如果这样的理解过于牵强的话，我们还可以从社会不同阶层的衣着表现来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过去，一个人的贫富主要是观其田地、房屋的多少，田地、房屋多，附之于田地之上的财产就多，反之就少。通过调查得知：阿车人的贫富之别在服饰上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主要指解放前）。一般说来，家庭富裕一点的人家，服饰较为考究，颜色种类齐全，镶的道数也多；家庭一般的人家，服饰较简单，颜色单调，镶的道数也少；而家庭贫困的人家服饰更为简单，甚至不做镶服。现存古式镶服者大都是以前比较富有的人家（即以前的地主、富农或豪富人家的佃户）。因此，人们常常把穿镶服的人与有地位的人联系在一起。“文革”期间还说他们是穿过镶服的人而另眼看待，弄得这些人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也不是普遍如此。“文革”期间的那种做法从根本上混淆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概念，应予否定。现在我们决不能用服饰作为划分贫富贵贱的尺度，更不能说它是某个阶级的服饰，而只能从民族性这一特征来探讨它。然而民族（包括服饰）除了民族性外，还有社会性的特征，如果我们暂且撇开其它，而从社会这一窗口观察，服饰与经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人们的物质文化在服饰上的集中反映，反过来说：阿车服饰的构造是象征着某种财产关系的。

再次，服饰的佩带首饰与生活习性有关。史书中有夷人“俗尚巫鬼”的记载。今阿车服饰也或明或暗地反映出这种旧生活习俗的某些痕迹。首饰主要是银制品，银是阿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据说佩带银饰有几种用途：一则光亮美观，使服饰琳琅满目增添光彩；二则能保佑五谷满仓、家庭和睦、生活幸福；三则能迎合灶神爷饮便当、禳灾灭祸。因此，每一个农家妇女都或多或少地佩带一点银器。也正因如此，阿车人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俗。一旦有人临终时，都要切一块银子放其嘴里，以示送给死者的“礼物”，好让他在阴间度太平日子。死者得到这份“礼物”后也就能瞑目安息于黄泉了。由此看来，阿车人对于银子如此珍重，不是出于银价的高贵，而是一种物神心理的流露。至于在服饰及其饰品上的一些诸如狮子、鱼案、蝴蝶、罗汉之类的图案，据说那是为了克制病魔和毒蛇猛兽的。阿车人以为：身上佩带一些这类图案，病魔就不敢来侵扰，邪污就沾染不上，一切毒蛇猛兽就会逃之夭夭了。当然这是人们尚未冲破愚昧，科学尚未被理解时的一种幼稚而模糊的意识，是原始自然崇拜的产物，在这种旧意识的

的布颜色单调且较麻烦又缓慢，做一套衣服须得一年半年的艰苦劳动，不能满足需要，逐渐被淘汰了。当时的服装款式一般无领子。大面襟、短袖，外加一节活套袖子，用暗钮或针线固定，需穿短袖时取去活套袖子，需穿长袖时又把它接上，在接口处套上一层绣有花纹的布带子，看上去就犹如镶制一般，衣的托肩及下摆边缘都是相拼起来的，一般用本色的布（可能当时没有或少有花布），最多在拼接缝中压进一线白色以突出线条。很少用刺绣，偶而也可见一些镶上一条现成丝线的，但为数甚少，只有非常富有之家才能做得到。相拼的纹路沿衣的边缘多成直线条，形成前后两个对应的燕尾状图案。裤子穿大筒套裤，一般不做镶裤。头饰多用“鸟苔”，“鸟苔”为满语，即作“帽贴”，它是类似帽箍一样的东西，用两条中间宽大两头细小并绣有各种花草图案的布带连接而成的。戴在头上左右宽大前后细小，有如花瓣贴在头上一样，有条件的再配上银饰品，使之耀眼夺目。从这些服饰特点和人口迁徙状况以及与其他支系的服饰比较，看来这种服饰约有300多年的历史，是清代阿车人的代表性服饰。

到了清末，阿车服又有了新的变化，人们常说：“一朝皇帝一朝天”，这通常是指政治制度的变迁而言的，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人民的衣着举止常常加以限制。例如清朝时代不准人们剪发辫，行跪礼拜，在解放前不许穷人穿有领子的衣服等等。此外，政治制度变革了，人民的精神风貌自然也相应得到进化，对于物质的要求和审美的需要亦有所提高。因此，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会影响到人们的装束。据说现今流行于阿车人中的服饰起于民国初年。从调查

的布颜色单调且较麻烦又缓慢，做一套衣服须得一年半年的艰苦劳动，不能满足需要，逐渐被淘汰了。当时的服装款式一般都无领子。大面襟、短袖，外加一节活套袖子，用暗钮或针线固定，需穿短袖时取去活套袖子，需穿长袖时又把它接上，在接口处套上一层绣有花纹的布带子，看上去就犹如镶制一般，衣的托肩及下摆边缘都是相拼起来的，一般用本色的布（可能当时没有或少有花布），最多在拼接缝中压进一线白色以突出线条。很少用刺绣，偶而也可见一些镶上一条现成丝线的，但为数甚少，只有非常富有之家才能做得到。相拼的纹路沿衣的边缘多成直线条，形成前后两个对应的燕尾状图案。裤子穿大筒套裤，一般不做镶裤。头饰多用“鸟苔”，“鸟苔”为满语，即“帽贴”，它是类似帽箍一样的东西，用两条中间宽大两头细小并绣有各种花草图案的布带连接而成的。戴在头上左右宽大前后细小，有如花瓣贴在头上一样，有条件的再配上银饰品，使之耀眼夺目。从这些服饰特点和人口迁徙状况以及与其他支系的服饰比较，看来这种服饰约有300多年的历史，是清代阿车人的代表性服饰。

到了清末，阿车服又有了新的变化，人们常说：“一朝皇帝一朝天”，这通常是指政治制度的变迁而言的，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人民的衣着举止常常加以限制。例如清朝时代不准人们剪发辫，行跪礼拜，在解放前不许穷人穿有领子的衣服等等。此外，政治制度变革了，人民的精神风貌自然也相应得到进化，对于物质的要求和审美的需要亦有所提高。因此，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会影响到人们的装束。据说现今流行于阿车人中的服饰起于民国初年。从调查

所得的材料判断，此说亦当无误。这种服饰总体上承袭了传统的款式，而在局部上比以前改进了许多。再以前文所举袁翠仙于1938年缝制的镶服为例，它大小适中、合体，穿着舒适、方便，改变了过去的袷装式结构，佩带装饰也较之以前更加精美。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增加服饰的佩带，在原来的套服之外增加一块围腰，围腰略呈扇形，用彩线绣花组成“人”字形图案，中央镶一块精绣的心子（一般绣“喜鹊鸣春图”或“蝴蝶采花图”）。穿戴时用一条银链固定上端的两角套在颈上，中间用两条飘带系于腰间，既增添了服饰的美，又起到了保暖的作用，现在的阿车妇女特别喜爱这种围腰。事实上，现今穿镶服的人不太多，而戴围腰的人却很普遍，几乎每一个阿车女子都有一块，围腰已成为今天阿车人的代表性服饰之一。

（二）从部分装饰扩展到整体装饰。以前的镶服多限于上衣和头饰上，造型粗俗，图案也很少，而现在裤子、鞋子也都做镶了，从头至脚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三）采用多色配套加强服饰的色彩。在制作镶服的过程中，除了手工绣制外，还要选配各种颜色的布料，使服饰更富有特色。（四）由翘尾帽更替了原来的帽贴。“翘尾帽”一词，由彝语“鸟琢曼利”翻译而得。这种帽子，由四块精绣的布组成无顶匡式帽，上方剪成浮云状，后两块接口部位向上翘起，恰似母鸡的尾巴，有条件的在翘尾帽的边缘加上各种银饰，没有银器的，则用银灰色的丝线仿绣成银饰以增光泽。然而在现阶段这种头饰又日趋减少，代之而起的则是包头巾了。

总之，阿车服饰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其寓意上都赋予了新的内容，

人们不断地把日益发展的物质文化和审美价值融合在一起，美化自己的生活，同时通过新颖的服饰造型和精湛的服饰工艺来显示自己的技艺。因此，构图及造型都各具风采，一般人也很少知道其中的原始意义了，而只是从美学角度去欣赏它罢了。

纵观阿车服饰的发展，在形式上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由传统型向舒适适用型发展；在内容上由原始物拜观念向美学观念过渡。也就是说：阿车服饰的发展使民族性和艺术性越来越走向较高的统一。

四、服饰制作及其工艺

如果把阿车服饰看作是一种艺术品，那么，前面所述只是呈现给观众的一个可感的实体，而服饰的制作，则是构思和创作的过程。常言道：画竹要先有成竹，起屋应须有蓝图。同样，服饰制作也要先有“成衣”和“蓝图”，只不过阿车人把这种“成衣”“蓝图”，贯穿于穿针引线之中一次完成罢了。阿车服饰的制作主要是剪裁大件和配色装饰两个方面（不包括银饰和其他金属饰品）。剪裁大件指的是选择^{时今}适合的布料做出得体的底衣；配色装饰指的是各种配色材料和绣制图案以及镶拼的过程。其中后者是主要的，它是使服饰具有独特风格的主要手段，在配色装饰中又有描摩、刺绣、镶贴三种基本工艺。

描摩就是要描绘出各种花纹图案，也就是构形，它一般用颜料把图案直接勾画在布条上，颜料多数是自制的，一般用墨和树汁等配制而成。镶衣的材料有几种制法：有些在原勾画的图案上添加彩线，有的则不加，如果是采用原样花纹，在颜料中渗入一点猪胆汁或芭蕉树

汁，以防洗涤时退色。

刺绣是用针线勾勒图案的方法，主要有挑花和梭花两种，挑花用明线表现图案，工艺较之梭花简单些，速度亦较快，一般依其事先画好的纹路添加彩线，手艺高的人可不用画而直接用线。梭花由线的明暗两种状态构成图案，它没有现成的纹路可循，构思和绣制都一次完成，工艺精度要求较高。

镶贴是要把各种镶衣材料（包括画的、绣的、印花等布条）缝在大料上，它是制作一套服饰的最后一道工序。但不是无选择的拼接，在整套服饰的布局、色泽的对比度等方面都很有讲究，搭配得当，使服饰具有优雅、端庄之感；搭配不当反而觉得花梢、臃肿，损坏了服饰的美。阿车常用的配色方法是：红黑相拼、蓝白相接，蓝黑底红黄线，这样色彩的对比度较强，尚能引人注目。当然对于美的判断是难作一刀切的，审美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也有特殊性的原理，具体对某种事物的审美感受因人而异，因民族而异，还因时代而别。古时阿车善黑，近代蓝黑红并举，现代赤橙黄绿青蓝紫俱用。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对于美的享受也更为优厚，但阿车服饰那新颖的造型、斑斓的色彩、巧夺天工的技艺，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页仍不失其美的价值。

综述阿车服饰，紧紧围绕一条：就是阿车（彝族）文化的源流。通过服饰这一条线索，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彝族（包括哲学、宗教、美学等）的历史发展，对于今天民族学的研究和发掘民族文化遗产、促进民族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都是积极意义的。

（写于一九八七年四月）